

今年四月汽车销量同比增长一倍多

本报记者 赵益普

根据巴基斯坦汽车制造商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2025年7月至2026年4月,巴基斯坦累计汽车销量超过12.7万辆,同比增长52%,各细分品类销量均有增长。今年4月,该国汽车销量超过1.7万辆,同比增长117%。

巴基斯坦拥有近2.6亿人口,家庭拥车率约1%,汽车市场增长空间巨大。据巴基斯坦《新闻报》报道,今年3月,巴基斯坦汽车产业融资额达42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助力众多车企扩大产能、推出更多购车补贴,市场加速扩容。

长期以来,巴基斯坦汽车市场尤其是家用轿车市场由日本车企主导。近年来,中国车企长城、名爵、长安、奇瑞、比亚迪、广汽等加快进入巴市场。巴基斯坦汽车制造和经销商沙特汽车首席执行官哈桑·曼沙表示,多元化的良性竞争,有助于提升巴基斯坦汽车制造业的整体水平,满足消费者对汽车价位、功能的不同需求。

巴基斯坦致力于推动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助力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不久前公布的《巴基斯坦新能源汽车规划2025—2030》提出到2030年实现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汽车总销量30%的目标。政府呼吁在生产和销售新能源汽车的同时,要同步实现储能电池的本土化生产。政府还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将电动巴士和电动摩托车引入公共交通系统。

受中东局势影响,巴基斯坦汽油价格上涨,当地民众对于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增大。“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巴基斯坦汽车产业的未来方向。奇瑞、比亚迪等中国车企拥有丰富的新能源汽车研发和生产经验,这正是巴基斯坦市场需要的。”巴基斯坦科学技术部本土研发局局长沙比尔·阿尔沙德对记者表示,巴政府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巴实现全链条生产,帮助巴基斯坦更快实现汽车产业绿色转型,也欢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车企深耕巴基斯坦市场。

(本报伊斯兰堡5月21日电)

协力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本报记者 高丽敏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是“立足本地,影响全球”。这一主题强调,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需要国际合作,更离不开各国地方政府、企业、社区和公众的共同参与。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最新研究,当前全球用于自然保护和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资金投入,仍远低于应对生态危机所需水平。森林退化、海洋污染、栖息地破碎化,以及极端气候事件频发,使得生态系统承压加剧,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依然面临挑战。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的多项评估表明,土地利用变化、资源过度开发、污染、气候变化以及外来物种入侵,仍是导致全球生物多样性问题恶化的主要原因。相关研究显示,大量资金仍持续流向导致森林破坏、土地退化和海洋生态恶化的相关产业,而真正用于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投入仍明显不足。

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2022年达成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出“30×30”目标,即到2030年,将全球30%的陆地和海洋纳入保护区或其他有效区域保护措施中。多国围绕这一目标持续推进国家行动计划更新、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生态修复工程,全球生态治理正逐步从制定目标转向落实行动。在2025年2月底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16)续会上,各缔约方就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融资方案等重要议题达成共识。

生物多样性治理离不开国际社会同心协力,许多国家和地区已采取积极行动并取得进展。2020年,巴西政府成立亚马孙委员会并执行“绿色巴西”计划,加强亚马孙雨林地区的执法保护,毁林率连续下降。2024年,欧盟通过《自然恢复法》,加快湿地、森林和授粉昆虫栖息地修复。多个非洲国家推动跨境生态保护区建设,加强大型野生动物迁徙通道保护。越来越多国家开始进行自然资本核算,将生态价值纳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中国是最早签署和批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之一,始终坚定履行承诺和义务,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不断迈上新台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在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由“形成共识”迈向“落实行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表示,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取得的进展令人印象深刻,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有益经验。

报告显示去年中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

本报柏林5月21日电(记者刘赫)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21日发布《2025年外国企业在德国投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较上年增长14.6%,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中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

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子与自动化、交通与物流、能源与原材料及数字化等领域。超过1/5项目涉及生产与研发,这一比例高于外国企业在德投资项目整体平均水平。

报告撰写人、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专家托马斯·博扬说,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德投资活动持续扩大,表现十分强劲,且投资布局呈现高度多样性,涵盖工业应用、前沿技术及知识密集型服务等领域。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将生产和研发进一步整合至其德国业务体系中,“这不仅体现出德国市场对中国企业投资的长期吸引力,也反映出中国企业正持续加快国际化布局 and 全球拓展步伐”。

本版责编:邹志鹏 张慧中 褚君

探访马来西亚沙巴州“山打根死亡行军”遗迹——

“这些遗迹和幸存者的讲述就是日军侵略行径的铁证”

本报记者 章念生 白元琪

第一现场

“1999年纪念园落成至今,每逢4月25日‘澳新军团日’及8月15日‘山打根纪念日’,园内都会举行追思活动,悼念80多年前在此牺牲的战俘。来自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的代表和不少战俘后裔远道而来,与当地民众相拥而泣,场面哀恸,令人动容。”马来西亚沙巴州山打根纪念园负责人朵莉逊告诉记者,这里不仅记录了盟军战俘的血泪史,更见证了当地民众与战俘并肩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艰苦岁月。

二战期间,2700多名澳英战俘被日军押解至山打根,遭受长期劳役与折磨。1945年初,随着盟军节节胜利,日军将大部分战俘强行驱入热带雨林,迫使其开始长达260多公里的徒步行军,最终仅6人生还,史称“山打根死亡行军”。记者眼前的这片纪念园,正是当年战俘营旧址,也是“死亡行军”的起点。尽管草木丛生,但那段记录日本军国主义反人类罪行的历史,从未远去,更不该被忘记。

营地苦难——“我们和狗一拥而上抢食”

走进山打根纪念园,入口处的三维地图模型还原出当年战俘营的布局:铁丝网环绕,低矮营房林立。自1942年起,多批被转运至山打根的战俘,沦为日军修建机场的“奴隶”。“他们在酷暑烈日下清理密林、开凿岩石,每周工作6天、每天超过10小时。”讲解员伊吉介绍,施工地质多为浅层凝灰岩,在烈日下会反射出刺眼强光,导致许多战俘角膜被灼伤。

战俘的居住条件同样恶劣。现场资料显示,他们挤在棕榈叶搭建的亚答屋内,每间住60余人,内部鼠蛇横行、蚊虫滋生。此外,为严防澳英两国战俘私下联络,日军将其中一方剃光头——一旦不同头型的人被发现接头,便会受到重罚。

昔日营地的大多数设施已被日军烧毁,残存的一台锈迹斑斑的挖掘机格外醒目。“战俘们不愿为侵略者卖命,便通过各种‘小破坏’来拖延工期、表达愤怒。”伊吉说,曾有一名工程师出身的战俘偷偷在发动机油底壳里撒沙子,使这台挖掘机彻底瘫痪。

为驯服战俘,日军发明了名为“笼子”的酷刑:将窄木笼架于木桩之上,四周以数厘米宽木条拼接,高不足一米。被囚者无法站立伸展,只能蜷缩其中,任凭日晒雨淋。展板资料显示,19岁列兵基思·博特里尔曾被如此关押40天,“笼子挤了17个人。前3天没有水,第三天晚上士兵会强迫你喝脏水直到呕吐;前7天没有食物,且禁止说话。每天傍晚我们会挨一顿名为‘体育锻炼’的毒打。厨师把泔水倒进槽里喂狗时,我们和狗一拥而上抢食。”

战俘们还常集体遭受虐待。幸存者比尔·斯蒂佩维奇曾回忆一种名为“飞行练习”的暴行:“我们被命令张开双臂水平站立,在烈日下暴晒。日本兵轮番殴打我们的腋下和肋骨。如果有人因疼痛呜咽或畏缩,换来的将是新一轮毒打。”

在遗址一角,记者看到一座经修复的水泥储存室,那是日军厨房的原址。与战俘们非人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军守卫补给充足。二战史学者莱内特·希尔弗介绍,随着战局急转直下,战俘的口粮被进一步克扣。到1944年底,他们只能靠满是蛆虫的陈腐大米维生,极度饥饿下,甚至抓苍蝇(鼻蝇)穿在铁丝上烤食度日。

生死行军——

“所谓‘战略转移’被证明是一场有组织的屠戮”

园内高处的一座仿木制纪念亭庄重简

洁。亭内展陈的行军路线和口述史料揭开了那段惨烈的“山打根死亡行军”史。

“1945年上半年,为防止盟军解救,日军将战俘分三批向西转运至兰瑙。所谓‘战略转移’被证明是一场有组织的屠戮。数百公里的热带雨林行军路,成了绝大多数战俘的生命终点。”伊吉说。

1945年1月28日,首批450多名体力较好的战俘被分为9组率先出发。“当时正值雨季,为了穿过沼泽,战俘们被迫行走在仅约一米宽的碎竹板路上。谁若滑倒摔断了腿,便会被当场处决。”伊吉介绍。

战俘们背负日军的大米和设备,赤脚走在树根、乱石和沼泽中,食不果腹。铅笔粗的水蛭与携带疟原虫的蚊虫不时叮咬,日本兵在背后用刺刀驱赶。基思·博特里尔在证言中写道:“行军途中,我们不断目睹同伴倒下并被处死,空气中弥漫着先头队伍遇难者的尸臭。”最终,约350人勉强抵达兰瑙,但在更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多数人不久便死于劳役、疾病与饥饿。

1945年5月29日,第二批500余名战俘启程。长期饥饿与疾病使他们身体极度虚弱,疟疾、痢疾及皮肤病蔓延。莱内特·希尔弗说:“许多战俘身上的溃瘍严重到连胫骨都清晰可见……即便如此,他们仍被迫继续行走。”约一个月后,仅180余人抵达兰瑙。他们到达后发现首批抵达的同伴只剩下6人。

“死亡行军”进入尾声时,日军彻底丧失了人性,纵火焚毁了大部分营区,将近300名病重无法行走的战俘遗弃在荒野。1945年6月9日,最后一批约70名战俘被迫上路,这一次,无一人抵达终点。

“行军途中,共有6名战俘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成功脱险。”伊吉告诉记者,这6名幸存者与当地民众的共同正义,最终将作恶的日军主要头目送上了正义的绞刑架,也让“死亡行军”的暴行彻底公之于众。

纪念亭内的电子照片墙滚动播放着遇难者影像,不少参观者驻足无言。战后,调查人员走遍山打根营地原址、周边丛林、数百公里步道以及兰瑙,最终发掘出2100多具澳英战俘遗骸。望着照片中一张张年轻的面孔,英

名幸存者之一。

然而,由于告密者出卖,秘密救援网络不幸暴露,日军随即展开疯狂报复。大批组织成员被捕,遭受灌水、吊刑、拔指甲等折磨。重要成员马修斯、韦尔斯和韦顿经历严刑拷打后英勇牺牲。这便是历史上惨烈的“山打根事件”。

展陈资料记录了组织成员约翰尼·冯的自述,他在被捕后的一个月,受尽了酷刑:“他们让我跪在布满尖刺的木板上,膝盖处横放重木杠,两名士兵如玩‘跷跷板’般在两端反复下压。更有所谓的‘柔道高手’在室内肆意摔打、扭断我的肢体。我曾被迫塞进特制的椅子上,任由他们持续毒打头部。”

战俘后裔戴维·里森在纪念园的网页上评论道:“这座纪念园不仅属于那些未能回家的战俘,也属于冒死相助的山打根市民。这是一处重要的历史警示地。”

据统计,马来西亚沙巴州共有约16%的平民死于日军暴行。当时日军在城镇安插大量告密者,强取豪夺,让当地民众长期生活在极度恐惧中。朵莉逊告诉记者,经常有日本年轻游客问她:“这些都是真的吗?为什么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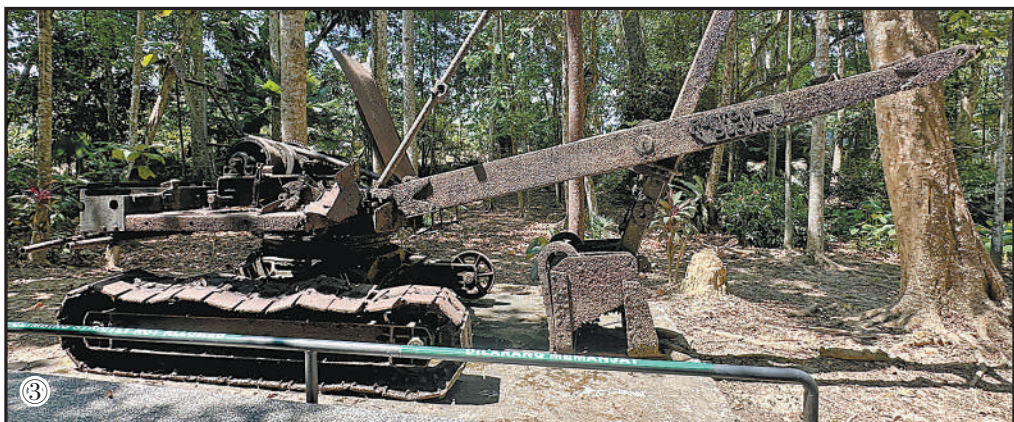
们的课本上从来没有讲过此类内容?”她总是坚定地回答:“这些遗迹和幸存者的讲述就是日军侵略行径的铁证!”

位于山打根市区的殉难华侨纪念碑,见证着日据时期华侨先烈们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赤胆忠心。山打根中华商会理事长谢鹤表示,铭记历史并非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警示未来。“国际社会应正视由鲜血写就的二战史实,时刻警惕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共同筑牢和平根基。”

(本报马来西亚山打根电)



图①:山打根纪念园内的黑色花岗岩纪念碑。
图②:参观者阅读纪念园情况介绍。
图③:山打根纪念园内的挖掘机遗存。
图④:位于山打根市区的殉难华侨纪念碑。
以上图片均为本报记者白元琪摄,版式设计:张芳曼



国游客史蒂夫感叹:“日军完全丧失了基本的人道底线。这不是一场普通行军,而是彻底的死亡驱逐。”

历史之鉴——“国际社会应正视由鲜血写就的二战史实”

纪念园北部设有一处圆形平台,中央矗立着一座黑色花岗岩纪念碑。碑身刻有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和英国玫瑰,三国的特色花卉交织盘绕,象征着不同民族共同抗日的集体记忆。

日据时期,山打根民众秘密组建地下组织,向战俘运送食物和药品。史料记载,帕吉纳丹地区的负责人库隆曾多次冒死营救战俘,并于1945年6月成功救出出逃的炮手欧文·坎贝尔——他也是“山打根死亡行军”的6



环球走笔

数智时代,守住本心才能守住快乐

车斌

“社交媒体是一种人们乐于使用,但经过反思后又认为毫无用处或毫无价值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浪费时间商品。”这句话出自近期发布的一份《世界幸福报告》,道出了当代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普遍困境。

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牵头,联合牛津大学福祉研究中心、盖洛普公司共同编制的2026年《世界幸福报告》,专门聚焦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过去10年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25岁以下年轻人,幸福感直线下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度使用社交媒体。数据直观显示,每天沉迷社交媒体超过7小时的人,其幸福感远低于日均使用不到1小时的人。无论是学者的数据分析还是家长的主观感受,结论都一致:重度使用社交媒体,正在侵蚀青少年的幸福感与心理健康。

为什么社交媒体让人上瘾,却悄悄偷走了快乐?答案藏在三重现实困境里。

其一,越刷越麻木。被动浏览类社交平台问题尤为突出,极易造成屏幕使用时间失控,陷入成瘾式浏览。平台依托算法精准投喂碎片化趣味内容,持续提供即时快感,让人不自觉陷入无意识“盲刷”,在无意义的信息流中消耗大量时间。

其二,越刷越内耗。社交平台充斥着滤镜包装的精致人设与完美生活,不断放大青少年的攀比心理与成长焦虑。同时,网络恶言评论、圈层对立等乱象频发,持续侵蚀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与价值认知。即时快乐转瞬即逝,累积的精神内耗却不断加重。

其三,越刷越孤独。线上互动终究替代不了真实社交。多项研究证实,重度社媒使用者的孤独感远高于普通人群。频繁的线上点赞、互动,无法填补现实情感的空缺,反而让人陷入越刷越孤独、越孤独越刷的恶性循环。

本质上,这是一场关于“注意力”的争夺战。想帮年轻人把注意力抢回来,得靠政府、学校、家庭、平台一起努力。

前不久,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市政府举办了“奇妙世界嘉年华”活动,由音乐、歌舞、巨型气球和旋转木马组成的欢乐场景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在这里,简单的场景创造了面对面的相遇和互动,这些所带来的真实幸福感是社交媒体无法提供的。

澳大利亚是全球首个通过立法限制社交媒体用户最低年龄的国家,法律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主流社交媒体账号。还有许多国家正在行动:美国10多个州推出了限制措施,法国、新西兰、英国也在推进相关法案,马来西亚计划今年落地类似政策。中国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内容上画红线、平台上压责任、模式上升级防护等,防止青少年沉迷网络。措施背后的逻辑很简单,正如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所言:给社交媒体设定最低使用年龄,跟设置饮酒年龄一个道理。先给孩子一个干净的成长环境,等他们有了自控力和判断力,再去面对复杂的网络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Z世代也在觉醒,开始了“反向操作”。编织、针线活等慢生活越来越火,海外甚至刮起了“祖母风”。年轻人主动拥抱质朴、真实的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对社交媒体虚拟内耗的一次温柔反击。说到底,技术不是天敌。社交媒体可以是看世界的窗口,也可以是吞噬时间的泥潭。关键在于怎么用它:主动克制,它能为你赋能;被动沉迷,就会被洪流裹挟。毕竟,在这个数智时代,守住本心才能守住快乐。